

焦虑、逃离、超越：从《平民之宴》看格差社会中的日本人

熊 芸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

【摘要】本文以林真理子小说《平民之宴》为研究对象，结合社会认同理论，剖析当代日本格差社会中不同阶层个体的身份认同困境与行为选择。聚焦三类人物：中产阶级主妇由美子竭力通过教育投资维系阶级地位；其子翔作为“低欲望一族”代表，主动放弃阶级攀升以追求个人自由；底层女性珠绪则在阶级歧视触发下，通过考取医学院实现阶级跨越。研究表明：日本学历主义与家庭核心化促使中产阶级将教育异化为阶级再生产工具；经济停滞催生的代际断裂导致青年形成“低欲望”生存哲学；底层个体通过模仿强势群体可突破阶级固化，但需付出巨大代价。三者共同印证社会认同差异深刻支配个体生存策略——捍卫、逃离、或超越，其本质是对阶级价值与资源分配权的争夺。珠绪的成功逆袭批判了血统决定论，为阶层流动提供文学想象，呼应了泰弗尔理论中“弱势群体通过模仿强势群体实现自尊维护”的路径。

【关键词】格差社会；社会认同理论；中产阶级；低欲望；阶级跨越

【收稿日期】2025 年 8 月 15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9 月 15 日 **【DOI】**10.12208/j.ssr.20250373

Anxiety, Escape, Transcendence: The Japanese in a stratified society through *A Banquet for the Common People*

Yun Xio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Zhongqiao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Hayashi Mariko's novel *A Banquet for the Common People* through the lens of social identity theory, dissecting identity crises and behavioral choices among individuals from distinct social strata in contemporary Japan's stratified society. Focusing on three archetypes: Yumiko, a middle-class housewife striving to maintain status through educational investment; Sho, her son representing the "low-desire youth", who renounces class mobility for personal freedom; Tamio, a marginalized woman who achieves class transcendence by entering medical school after experiencing class-based discrimination. The research reveals: Japan's academic credentialism and nuclear-family centrism have instrumentalized education into a tool for class reproduction among the middle class; Generational fractures stemming from economic stagnation fuel the "low-desire" survival philosophy in youth; While disadvantaged individuals can disrupt class rigidity by emulating dominant groups, such transcendence demands severe sacrifices. Collectively, these cases demonstrate how divergent social identities dictate life strategies—defending, escaping, or transcending class—all ultimately contes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symbolic capital and resources. Tamio's counterattack critiques hereditary determinism, offering literary imagination for upward mobility and echoing Tajfel's proposition that "marginalized groups preserve self-esteem by adopting dominant-group practices."

【Keywords】 Stratified society; Social identity theory; Middle class; Low-desire youth; Class

1 引言

《平民之宴》是日本当代知名作家林真理子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以当代日本格差社会背景，通过某中产阶级家庭及其儿子翔与底层女性珠绪的成长轨迹，折射阶层固化下的身份认同困境。日语的“格差”是中文

“差距”之意。人们认为，“格差社会论所意味的“差距”，不仅指收入差距，还包括社会各阶层在消费方面、信息获得机会或教育机会等方面的差距以及地区差距等。所谓“格差社会”，是指社会阶层之间的各种差距呈现出明显扩大和相对固定化趋势的社会

[1]。在此背景下，不同阶层的个体因获得的社会认同差异，形成截然不同的身份建构策略与行为选择。本文以泰弗尔社会认同理论为分析框架，该理论揭示：个体对群体资格的认知及其情感价值依附，直接支配其社会行为。当群体资格贡献于积极认同时，个体会竭力维系或追求该资格；反之则可能逃离甚至重构身份[2]。基于此理论，本论文研究重点为：阶层差异如何影响个体对社会认同的态度；面对认同困境时，不同阶层人物采取的生存策略；其选择背后的社会心理动因。通过解构由美子（中产捍卫）、翔（低欲望逃离）、珠绪（底层超越）三类典型人物的选择，研究构建起“社会认同-生存策略”的响应模型，使日本阶级固化、代际价值断层及底层流动困境获得具象化阐释。

2 中产阶级的焦虑和捍卫

小说中的主人公由美子出身医生世家，自幼充满优越感。幼年因父亲早逝家道中落。但其母通过销售塑形衣重振家业，使家庭重返中产，此经历深刻影响了由美子的阶级认同，对她的人生经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由美子努力考入国立大学、和从早稻田毕业、就职于一流的公司的健太组建了家庭，构建标准中产家庭。泡沫经济时期的经历使其内化了物质主义价值观——为跻身中产阶层，他们以工作为生存核心全力拼搏。最终建立的富足体面家庭，兼具社会信用与阶层地位。作为典型中产主妇，她清醒认知到格差社会中阶级标签的符号价值：它不仅是经济保障，更是身份认同的根基。这种认知驱动她不遗余力地维系中产阶级身份，将阶级地位视为必须捍卫的生命线。

现代社会不仅充满了挑战和机遇，日益凸显的竞争和压力，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焦虑，导致现代人产生恐惧迷茫等负面情绪。他们“担忧失去既得的利益，担忧自己当下所处的社会地位过于平庸或者堕入更低的阶层”。[3]由美子也深陷焦虑之中，应该如何维持家庭发展能力，如何让儿女的人生能在中产阶级的起点上继续往上走。她选择通过子女的教育来实现，想让自己和丈夫的人生在儿女身上复制[4]。

日本高度产业化时期的“后发”“赶超”型经济发展模式，缔造了日本非同寻常的“学历主义社会”，它与“以孩子为中心”的现代日本家庭核心价值观相结合，成为中产阶级趋之若鹜的目标[5]。教育成了中产们在代际间保持生活水准和社会地位的主要手段。由美子对一双儿女的教育可谓煞费苦心。她给儿子规划了人生路线，精心营造家庭的教育氛围。

但是她的努力并没带来相应的回报，在她的严密

规划和学业的重压之下，儿子进入高中后提出了退学。由美子在劝说无效下，只能暂时同意儿子休学。由美子心碎了，“望着中午才起床，起来就要看电视的儿子的背影，由美子心里觉得儿子很丑陋，象是在看一个不中用的东西”，在翔面前控制不住激动地“大嚷大叫”，变成了自己都无法相信的歇斯底里状。亲子冲突愈加升级，儿子最终被逼离家出走[4]。

代际冲突让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儿子退学、离家出走、没有正式工作，看着自己精心维护的家庭塌了一个角，她要誓死捍卫这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完整。她到儿子打工的地方试图劝说儿子重回家庭和学校。可是儿子提出了“更不像话”的要求，他要结婚。同时，结婚对象也让由美子崩溃，是一位来自冲绳的打工者。在由美子眼里，那是远离中产阶级的“那个世界”的人。由美子身上根深蒂固的中产阶级优越感根本不会允许一个底层社会的人成自己的家庭成员。否则，她苦心经营的家庭将下滑至“下流社会”，因此她强烈反对儿子的婚事。

儿子的学业、工作、婚姻全都偏离了由美子设计的路线。雪上加霜的是，已经通过婚姻步入上流社会的女儿也因为丈夫患抑郁症失业，被迫回娘家。由美子精心策划的中产阶级家庭捍卫和发展计划在走向失败。“再过10年等健治退休后成为一个普通的老人，我们家就成了一个社会底层的家庭了。”由美子在短暂的失望后，面对一岁半的外孙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小航你一定要努力，外婆就只有小航了，一定要把外婆从这种处境中救出去。”[4]而她的方法依旧是采用投资教育的方法，这也是她唯一的选择。

由美子的个体焦虑折射出日本中产阶级的集体性身份危机——对阶层滑落的恐惧本质源于中产群体资格所承载的情感价值与社会资本。当阶级标签成为自我认同的核心根基时，维持该身份便转化为生存本能。在此逻辑下，学历主义社会结构与家庭核心化价值观共同异化了教育功能：它不再是发展手段，而沦为阶级再生产的工具。通过子代教育复制自身阶层地位，成为中产阶级抵御格差社会风险的最系统化防御策略[6]。

3 低欲望一族的放弃和逃离

和努力捍卫中产阶级地位的母亲不同，儿子翔则日本“低欲望一族”的典型代表，对任何事情都无兴趣、没有干劲和追求。他们和体验过经济高度成长时代的父辈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截然不同。

作品中随处可见低欲望一族的他和充满焦虑的母亲之间的矛盾描写。母亲对他人生成功的强烈欲望和他的

低欲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不明白母亲让他努力的意义在哪里。迫于母亲的压力，他还是服从了母亲的安排。但在升入高中时终于爆发了，他提出了退学。面对母亲的劝说、愤怒、威胁，他“似乎一点也不理解。既否定，也不排斥”。外婆提出要给予他一笔巨款，让他出国学习改变人生，可翔却拒绝了。对20岁的翔如此缺乏干劲和好奇心，缺乏对未来的规划和追求，外婆认为他已经“死了”，“既没什么欲望，也不考虑将来，还说不要钱，这不就跟死人完全一样吗？翔，你才20岁就已经死了……”^[4]翔的婚恋选择也遭到母亲的反对。两人没有固定工作、像样的住所，工资微薄。但来自冲绳的珠绪身上特有的自由与洒脱，吸引了一直在母亲严密规划人生的重压下的翔。翔不顾家里的强烈反对，打算和珠绪结婚。

但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在珠绪努力考上了医学院，即将成功跻身中产阶级时，翔却选择了分手。他俩将不再是一个世界的人，翔拒绝努力去进入到珠绪即将到达的那个世界。“拼命努力的人都会让我感到压抑。在这种人身边，总感觉像是在责难似的”，“我本来就不善于跟非常努力的人打交道，呆在一起会特别的痛……”，“我呢，看着努力用功的人，虽然也觉得很厉害，但是既不懂憬，也不想变成那样”。^[4]他的恋人变成了追求上进的人，给他带来了压力，于是他放弃了爱情，继续无欲无求的生活方式。一个低欲望的日本当代年轻人的形象跃然纸上。

翔这样的低欲望一族和他们的成长环境有密切关系。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日本陷入了长期的经济萧条，充斥负面信息的所谓“失去的十年”里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缺乏远大理想，安于现状，不愿迎接挑战、承担风险，追求和享受封闭安逸的生活。只要自己能够享受到最低限度的幸福即可：衣可蔽体、食可果腹。最大的欲望就是“以自己的方式自由生活”，不受外界的干扰和影响，丧失对自我价值和生存价值的追求^[7]。

翔所代表的低欲望现象本质是经济结构转型催生的代际价值观断裂。其父母成长于经济高速增长期，在终身雇佣制与年功序列制保障下，通过企业忠诚换取物质满足，形成“劳动-晋升”的线性发展观。而翔一代身处泡沫经济崩溃后的长期萧条（所谓“失去的十年”），在就业市场流动化与阶层固化夹击中，翔这一代人体会到了大企业稳定雇佣体系崩塌引起的安全感的消解。同时，社会经济不确定性强化对舒适区的心理依赖，也激发了他风险规避本能。因此，低欲望既是对

竞争社会的消极抵抗（逃避母亲规划的中产陷阱），更是风险社会中自保策略的极端化。当外部世界无法提供可预期的回报时，将欲望压缩至生存基准线成为理性选择。这种“自我系统降级”虽消解了社会认同压力，却也导致主体性的空洞化。

4 底层阶级的挑战和跨越

在格差社会里，恋爱结婚势必遭遇阶层这一无法轻易逾越的壁障。小说里的珠绪来自冲绳，高中毕业，父母离异。她在东京打工月收入20万日元左右。从中产阶级的角度来看，“不上大学的打工生活就是坠落在社会底层”，珠绪在作品中的人物设定就是“下流社会”（底层社会）的一员。当她与翔打算结婚后，遭到了翔的母亲由美子的强烈反对，因为珠绪和翔所处的是两个相差很远的阶层。珠绪遭到了由美子关于阶层固化、优秀血统DNA论的羞辱，“谁能成为医生，从小就已经注定，不是医生家的孩子，就是头脑极其聪明的人，而你是不可能的。”由美子的羞辱和轻蔑激发了原本无欲无求的珠绪按照对方的模式实现自我价值的欲望^[4]。她选择的应对方法就是模仿强势社群以图自强，她决定要通过努力考上医学院^[8]。

所有她身边的人包括翔、珠绪的家人也不认为她难以办到。但是当珠绪做出了这个决定之后，她“微笑”“愉悦”“淡定”。这种淡然的态度和微妙的笑容是珠绪超越了盛怒的极限之后的一状态。这是愤怒之上所独有的一种从容。她打算拼命，为了名誉和自尊，还有自己无论如何都要得到的东西。

珠绪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到的努力。和“才20岁就已经死了”的翔不同，珠绪认为22岁的她“才刚刚开始”，“奋发努力的巨大能量充满了我的身体”。她的内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开始只是想赢得翔母亲的尊重，让其认可两人婚事，但在两年的努力过程中，她体会到了奋斗、努力所带来的快乐，并感觉到努力让自己的寿命得到了延长。自己努力所带来的愉悦感，这是她在以为的普通的打工生活中从来没有体会过的。

珠绪的阶级跨越实践印证了社会认同理论的核心命题：个体通过身份重构可达成三重主体性救赎——自我效能感提升（医学精英身份重塑自尊）；生存确定性强化（职业资本消解阶层流动焦虑）；存在主义价值确认（在归属需求与个性表达间建立新平衡）。这一过程本质是泰弗尔理论中弱势群体策略性流动的典型范本：当原生群体认同无法提供正向价值时，个体通过模仿强势群体（医学精英阶层）实现社群更迭^[9]。小说的作者借此完成双重文学建构：以珠绪的主体性实践解

构血统决定论，揭示教育资本对阶级固化的有限突破性；在制度性壁垒语境中植入底层能动性叙事，为格差社会的结构性困境提供人文主义解法。

5 结语

《平民之宴》通过由美子、翔与珠绪三类人物的命运轨迹，深刻揭示了格差社会中社会认同对个体行为的支配性影响。本研究结合泰弗尔社会认同理论发现：中产阶级的捍卫逻辑源于对群体资格情感价值的强烈依附（由美子将教育异化为阶级再生产工具）；低欲望世代的逃离选择本质是经济停滞催生的代际价值观断裂（翔以放弃社会竞争换取个体自由）；

底层的跨越实践则证明弱势群体可通过模仿强势群体实现身份重构（珠绪以医学精英身份打破血统决定论）。

小说的三重叙事印证了社会认同的悖论性功能：它既是阶层固化的枷锁，从由美子的血统偏见可以看出；也是突破结构性壁垒的杠杆，譬如珠绪的逆袭。《平民之宴》的文学隐喻具有双重现实意义。不仅批判日本学历主义与阶级世袭制对个体发展的扭曲，还在“低欲望社会”迷思中植入能动性火种，暗示阶级流动的可能性永远存在于主体觉醒之中。这种对“捍卫-逃离-超越”生存策略的辩证书写，使《平民之宴》这部作品超越社会批判层面，升华为对人之主体性的叩问。

参考文献

- [1] 胡欣欣. 社会差距问题及日本的相关研究[J]. 日本学刊, 2007(03): 129-142.
- [2] 张莹瑞, 佐斌. 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J]. 心理科学进展, 2006(3), 475-480.
- [3] 黄宁, 《拉里的家宴》: 现代焦虑的伦理书写[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18, 29 (02), 71-76.
- [4] 林真理子. 平民盛宴[M]. 王秀娟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7. 1-304.
- [5] 杜伟, 唐丽霞. 析日本新中产阶级的形成与社会影响[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03): 42-45.
- [6] 田晓虹. 日本中产阶级的生存困境与身份焦虑[J]. 日本学刊, 2007(5), 102-112.
- [7] 裘晓兰. 日本“无欲世代”的群体画像和成因探析[J]. 中国青年研究, 2019 (08): 113-119.
- [8] 王秀娟. 女性的自我价值判定源于何处——论林真理子《平民之宴》中的女性形象[J]. 世界文化, 2019(01): 33-35.
- [9] 徐翔. 文化资本视域下底层青年的阶层跨越路径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20(4), 78 - 85.

版权声明：©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